

清番禺崔弼辑撰《波罗外纪》文献研究

赵磊

(广州市黄埔区博物馆,广州 510730)

摘要:《波罗外纪》全书文字可分为辑录前人、时人作品和亲自撰写两部分内容,字数上前者约占90%,是全书主体部分,后者约占10%,服务于前者并弥补其不足。全书文献上至春秋中叶,下迄清代中期,时间跨度约2400年;文献所属历史阶段主要集中在唐代以后,而明清时期最多,占比超70%。全书文献征引广博,总数不低于45种,但在诸多细节处存在着文字错误、内容失实、指代不明、过度改动、重复辑录、分类不当以及篇章缺失等七类错漏。

关键词:崔弼;波罗外纪;文献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0)03-0029-07

乾嘉时期番禺崔弼辑撰《波罗外纪》(以下简称《外纪》)一书,是自隋以至于清南海神庙最重要的文献资料集。目前,闫晓青老师已点校出版了全新的《波罗外纪》,为该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文本基础;本人亦曾分别撰写《清崔弼辑〈波罗外纪〉考述》^[1]与《清崔弼辑〈波罗外纪〉续考》^[2]两篇论文,进行了初步研究。不过,从整体上看,学界对《外纪》的认识程度与研究深度仍不充分,特别是对有关该书所辑所撰文献的结构、来源以及错漏等问题尚未进行全面探索。本文试于此着力,以期有所裨益。

一、文献结构

在辑撰《外纪》时,作者崔弼采用了抄录、摘录以及叙述、描写、议论等多种方式,许多篇章内容驳杂、手段不一。故在考察全书文献结构时,不仅要从篇幅长短、内容多寡考量,还要自历史阶段、文献占比等方面入手来分析、解构。具体来说,可从以下两方面进行考察。

其一,从文字属性方面看,《外纪》一书可分为辑录内容和自撰内容两部分。其中,前者是指前人、时人的作品,其表现形式有碑刻、方志以及各种历史资料等,后者则为作者亲自撰写的内容。经梳理统计,可将全书各部分辑录、自

撰字数情况见表1。

由表1综合考察可知,辑录内容约占全书整体篇幅90%,自撰内容则约占10%。正文构成情况为:卷一《神灵》叙述了南海神庙中各神事迹、传说,其中95%以上篇幅为辑录前人著作,只有约5%的内容自撰。卷二《庙境》描写了南海神庙周边当前景物,以实景描写为主,故自撰内容占主导,约占66%。无论是总体字数,还是所占比例,在全书各卷中皆占据首位。卷三《法物》记述了庙内存放的重要物品,辑录占87.9%、自撰占12.1%。卷四《遗荫》记载了庙内树木、虫鱼以及殒质等有生命或无生命的生物,辑录占84.88%、自撰占15.12%。卷五《年表》除“夏商”条中“其祭海虽无明文”及末尾一句“所遣祭年分及祭官承祀不无罅漏,时据现存之碑录之,未及详考”为作者自撰外,余者皆辑录前人著述;辑录占98.77%,自撰仅占1.23%,在各卷中自撰内容总体字数最少、所占比例最低。卷六《碑牒》中,共辑录自唐至清历代碑刻73篇,辑录占98.74%,自撰占1.26%,亦属自撰内容比例较低的章节之一。卷七《文赋》中,除《修阿公坑记》一篇为自撰外,其余六篇皆为辑录前人著述,辑录占92.41%,自撰占7.59%。卷八《诗歌》分为三部分:一是“碑刻八

收稿日期:2020-03-01

作者简介:赵磊(1984—),男,河南信阳人,历史学硕士,广州市黄埔区博物馆文博馆员。

之一”皆为抄录清乾嘉时期南海神庙保存的历朝碑刻之文；二是“题壁”，为题写在南海神庙建筑墙壁上的诗文；三是“名集八之二”辑录前人诗作 49 种，作者自撰 7 种；总体上，自辑录占

86.51%，自撰占 13.49%。由此可知，作者选择将自撰内容散布各卷之中，从属于各卷所需，而非单独成卷，其用意亦在于以自撰内容服务于辑录内容，弥补辑录文献之不足。

表 1 《波罗外纪》各部分辑录、自撰字数统计表

| 项目 | 序言 | 卷一 | 卷二 | 卷三 | 卷四 | 卷五 | 卷六 | 卷七 | 卷八 | 目录及其它 | 合计 |
|------|------|------|------|------|------|------|-------|------|-------|-------|-------|
| 辑录字数 | 1010 | 4700 | 1000 | 1600 | 1200 | 2640 | 23200 | 8000 | 9500 | 3610 | 56460 |
| 自撰字数 | 690 | 300 | 2000 | 200 | 200 | 30 | 300 | 700 | 1500 | / | 5920 |
| 合计 | 1700 | 5000 | 3000 | 1800 | 1400 | 2670 | 23500 | 8700 | 11000 | 3610 | 62380 |

注：本表统计字数为约数。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自撰部分主要有三方面内容，现以卷一《神灵》为例进行分析：一是为支持个人观点而进行的简要议论，如“南海神”一篇有：“据此，则赤帝与祝融合而为一神”“祝融实炎帝之佐耳”等；二是叙述某种当前事实，如“明顺夫人”一篇中“今南海夫人称岑氏，庙之东有岑姓冒夫人之族，其男妇抱婴孩入庙，置座前，嘱姑娘怀汝，去之即不哭”等；三是为某个内容作说明，如“灵著”一篇中“此段似非灵著，以有期庙一语，故录之”，即是说明录万历年“广中查贼”事一节的说明。可以说，无论从字数、篇章，还是从功用上看，辑录内容都处于全书的主体地位，而自撰内容则处于辅助位置。

其二，从历史阶段方面看，全书文献构成情况见表 2。

表 2 《波罗外纪》文献各历史阶段字数统计表

| 项目 | 卷一 | 卷二 | 卷三 | 卷四 | 卷五 | 卷六 | 卷七 | 卷八 | 合计 | 所占比例 |
|------|------|------|------|------|------|-------|------|-------|-------|--------|
| 先秦字数 | / | / | / | / | 30 | / | / | / | 30 | 0.05% |
| 汉代字数 | 30 | / | / | / | 20 | / | / | / | 50 | 0.08% |
| 唐代字数 | 70 | / | / | / | 1330 | 1800 | / | 100 | 3300 | 5.78% |
| 宋代字数 | 1200 | / | 200 | / | 310 | 6300 | / | 400 | 8410 | 14.73% |
| 元代字数 | 700 | / | / | / | 50 | 4200 | / | 100 | 5050 | 8.84% |
| 明代字数 | 300 | / | / | 50 | 480 | 7500 | 6600 | 1600 | 16530 | 28.96% |
| 清代字数 | 2700 | 3000 | 1600 | 1350 | 450 | 3700 | 2100 | 8800 | 23700 | 41.52% |
| 合计 | 5000 | 3000 | 1800 | 1400 | 2670 | 23500 | 8700 | 11000 | 57070 | 100% |

注：本表统计字数为约数。

综上分析可知，作者在辑录、撰写《外纪》时进行了一定的编排和写作规划，全书结构严谨、分门别类清晰、编排意图明显，且在辑、撰过程中皆以原始文献史料的价值、状态为脉络，自撰部分不喧宾夺主、刻意突显，展现了一位传统学人的良好品行和学术修养。

据表 2 并结合全书内容可知：一是辑录内容中，最早的为《诗经》，最晚为嘉庆五年（1800），时间跨度约 2400 年。二是因卷一有“列朝祭祀考证”等篇章、卷五为历代祭祀列表、卷六和卷八分别辑录了历代碑刻和诗作，故上述四卷所录文献在各个历史阶段分布较为均衡。三是全书的基本文献集中在唐代以后，这些文献的多寡与南海神庙始建于隋开皇十四年（594）、唐天宝十年（751）封“广利王”等历史情况走向一致。四是明清时期文献最多，合计占比超 70%，其原因主要是明清碑刻、诗歌作品较多，且诸多叙述南海神庙情形文字作者或以明清文献为准，又或亲自撰述自己生活时代神庙状况。

二、文献要目

考察全书可知，作者在进行文献编订时，未对其出处进行统一标识，甚至对一些非常重要的文献来源只字不提。经仔细考证、梳理，《外纪》全书引述各类文献史料不低于 45 种，现依

其时序撮其要叙述如下。

其一,先秦时期《诗经》《尚书》。卷五年表之“夏商”一节中“成汤肇域彼四海”^{[3]547}一句录自《诗经·玄鸟》;同节中“禹甸高山大川”^{[4]46}、“声教迄于四海”^{[4]46}摘自《尚书·禹贡》,“弼成五服,外薄四海”^{[4]46}则录自《尚书·皋陶谟》。

其二,西汉戴圣编《礼记》。卷五年表之“夏商”一节中,“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则先代无不崇海祀者”^{[5]466}录自《礼记·学记》。

其三,东汉郑玄撰《礼记注》。卷一《神灵》之“南海神”篇中“其帝炎帝,其神祝融”^{[5]466}之内容录自《礼记·月令》。

其四,三国譙周撰《古史考》。卷一神灵之“南海神”一节中所引“以(为)炎帝与神农各为一人”^{[6]467}之语录自《古史考》。

其五,唐司马贞撰《史记·补三皇本纪》。卷一神灵之“南海神”一节中有关祝融与共工氏交战之内容,录自唐司马贞《史记·补三皇本纪》,而非汉司马迁之《史记》。

其六,唐杜佑撰《通典》。卷五《年表》之“轩辕式”“有虞氏”“周”“秦”“两汉”“三国魏”“南朝宋”“北魏”“隋”“唐”等内容皆录自《通典》。

其七,宋李昉等编撰《太平广记》。卷一《神灵》之“灵著”第一篇“张无颇”事,录自《太平广记》卷三百一十《神二十》;卷三《法物》“铜鼓”篇中“郑纲”事录自《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五《乐三》之“郑续”一节,其中所述内容主角原文为“郑续”^{[7]467}非“郑纲”。

其八,元《异闻总录》(作者不详)。卷一《神灵》之“灵著”第二篇“黄鲁直”事录自该书。

其九,元吴莱撰《古迹》。卷三《法物》“铜鼓”篇中引“庙有玉简、玉砚、象鞭”^{[8]9}等语录自该书。

其十,明李贤等撰《明一统志》。卷四《遗荫》“鱼”一节录自该书。

其十一,明郭棐等编《广东通志》。卷七《文赋》首篇明黄佐《粤会赋》,万历《广东通志》、雍正《广东通志》、乾隆《广州府志》等诸种皆有收录,但崔弼主要依据何种而录,值得讨论。经核对,《外纪》之《粤会赋》与乾隆《广东通志》之

《粤会赋》相比,字词不同之处超过62处,异体字亦超过20处,雍正《广东通志》与乾隆《广东通志》略同。与万历《广东通志》相比,字词差异有约20处,异体字有10余处。上述不同中,由于年代、刊刻等原因造成的文字差异之外,有两方面值得注意:其一,避讳,在《外纪》其他各卷各篇目中,崔弼十分注意避清圣祖“玄烨”、清世宗“胤祯”、清高宗“弘历”等本朝皇帝的名讳,而在《粤会赋》却一反常态,置这一惯例而不顾;反观乾隆《广州府志》却基本做到了上述避讳。其二,乾隆《广州府志》有三处长句脱漏,而《外纪》却全录该三句。考察该三句内容,与其说是无意脱漏,不如说是有意改写。如“(然)而天厌其胡,神运之谋。脱扬王于溃伍,肇无疆之圣休”^{[9]卷7.89}一句,似因有“天厌其胡”之句,与当朝统治者乃满人、故而删除不无关系。综上可知,《波罗外纪》与万历《广东通志》所载《粤会赋》无较大差异。虽然《外纪》在某些对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有明显侮辱性词汇中,进行了隐性处理,如把“蒙狄”改为“蒙古”“天厌其羶”改为“天厌其胡”“金虏”改成“金人”等,但没有改变《外纪》所录《粤会赋》依据明版《粤会赋》的事实。

其十二,明黎遂球《莲须阁集》。卷七《文赋》之《波罗铜鼓赋》一篇录自该集。

其十三,明末《见闻录》(作者不详)。卷一《神灵》“灵著”第三篇“广中蛋贼”事,作者自言录自《见闻录》,但未知何种,考其内容应成书于明末。

其十四,清雍正郝玉麟等撰《广东通志》。共有两处:卷一《神灵》之“南海神”一节有关南海神历代封号与清代神庙建筑格局的有关内容,以及同卷“明顺夫人”一节中《道书》有关“南海君姓祝名赤,夫人姓翳名鬱寥”等言,皆出自《广东通志》卷五十四《坛祠志》有关内容^{[10]1-2}。

其十五,清乾隆张嗣衍等撰《广州府志》。主要包括:正文前雍正二年《谕沿海居民敬神》;卷二《庙境》之“南海”“东江”“蚬江”“鬱水”“珠江”5处全部内容,以及“浴日亭”部分内容;卷六《国朝御祭文》25篇中的15篇,包括《顺治八年祭文》《康熙六年祭文》《康熙二十四年祭

文》《康熙二十七年祭文》《康熙三十五年祭文》《康熙三十六年祭文》《康熙四十二年祭文》《康熙五十二年祭文》《康熙五十八年祭文》《雍正元年祭文》《雍正三年祭文》《乾隆元年祭文》《乾隆十三年祭文》《雍正十七年祭文》《乾隆二十年祭文》等；卷七《文赋》之明钟夏嵩《波罗庙赋》；卷八《诗歌》之何宏《扶胥送别》、王士正《南海神祠》、梁佩兰《谒南海神庙》《南海神庙铜鼓歌》《南海神庙古木棉花歌》等5篇。

其十六，清乾隆任果等撰《番禺县志》。卷二《庙境》之“波罗江”一节中所言《县境图说》载“珠江至波罗江”水道情形，录自《番禺县志》卷一《舆图·县境图说》之内容；同卷“戢旗冈”“尉迟岩”和“龙头石”等三处出自该志卷四《山水志》相关内容。卷三《法物》之“铜鼓”一节中引檀默斋所述《番禺旧志》之言。卷七明钟夏嵩《波罗庙赋》、明叶廷祚《张邑侯甘霖记》、清屈士煌《南海庙施田记》等皆录自该志。

其十七，清张英等编撰《御定渊鉴类函》。卷一《神灵》之“列朝祭海考证”篇皆录自该书。

其十八，清孙廷铨撰《南征纪略》。卷二《庙境》“波罗江”篇中“南海庙在羊城东，海道八十里，曰波罗”^{[11]76}等语录自该书。

其十九，清王士禛撰《南来志》。卷二《庙境》“波罗江”篇中“三江下石门，东过沥激，东冲达于蚬江，由珠江会于扶胥之口，所谓波罗江也”^{[12]361}等语录自该书。

其二十，清钮琇撰《觚觚》。卷二《庙境》“浴日亭”篇中“南海之神，唐天宝间封为广利王，其庙遥对虎门”^{[9]28}等语录自该书卷七《粤觚上》之“南海神庙”一节。

其二十一，清朱彝尊《南海庙二铜鼓图跋》。卷三《法物》“铜鼓”篇中“广州波罗江上，南海神庙铜鼓二”^{[13]6}等语，录自朱彝尊《金石文字跋尾》之“南海庙二铜鼓图跋”篇。

其二十二，清吴震方撰《岭南杂记》。卷三《法物》“铜鼓”篇引“南海庙极宏敞”^{[14]卷上,12}等语，以及卷四《遗荫》之“榕”“木棉”二篇皆录自该书。

其二十三，清翁方纲撰《粤东金石略》。一是卷三《法物》“铜鼓”篇中“南海神庙铜鼓”一段录自该书；二是卷六《碑牒》之《南海神庙碑》

《皇祐五年牒》《尚书省牒》《南海广利洪圣昭顺威显王记》等4方碑刻以及卷八《诗歌》之《苏东坡先生浴日亭诗》文尾叙述之言，皆出自该书。三是《开宝南海神庙碑》文后叙述之文除“此行八分书”^{[9]卷6,49}一句为崔弼后加外，余皆为《粤东金石略》，同样《南海广利洪圣昭顺威显王记》《乾道重修碑》《庆元四年尚书省牒》《延祐七年祀海记》《陈白沙先生浴日亭和东坡韵诗》等5方碑刻文后叙述文字除个别词句为崔弼后加，余皆录自该书。

其二十四，卷八《诗歌》之二（应为三，笔者注）“名集”所录历代诗歌作品作者皆未名言录自何种书籍，考其内容可知，有些多种史料皆有辑录，而有些则已无据可查。现据作者所言，该部分内容录自历代文人之集，经梳理，涉及到的名人名集主要有：韩愈《韩昌黎集》、杨万里《诚斋集》、陈献章《白沙子全集》、王渐逵《青萝文集》、罗宾王《散木堂集》、黎民怀《清居集》、黎密《籁鸣集》、欧大任《欧虞部诗文集》、李云龙《啸楼诗集》、潘耒《遂初堂诗集》、史申义《过江集》、查慎行《敬业堂诗集》、梁佩兰《六荧堂集》、迹删鹭《咸陟堂集》、李紱《穆堂初稿》、王邦畿《耳鸣集》、梁无枝《南樵集》、杭世骏《道古堂文集》、许遂《真吾阁前后集》、凌鱼《书耘斋前后集》、宋湘《红杏山房遗稿》等，超过21种。

综上，将上述辑录文献与其原文比对后，亦可进行如下探讨：首先，在辑录方式上，有的原文抄录，如《御定渊鉴类函》《广东通志》《广州府志》《番禺县志》等；有的删改摘录，如《广东新语》《史记》《通典》等。其次，内容选择上，在诸种史料皆有记载时，作者会选择较古老典籍所载，如“礼器”“祭品”及《粤会赋》等皆择明代内容而非本朝。其三，文字校对上，辑录内容与原文皆存在诸多不同，如“张无颇”事有17处不同，“黄鲁直”事有5处、朱竹垞《南海庙二铜鼓图跋》有10处、“木棉”有7处不同等，可知其校对不甚精细。

三、文献错漏

综观《外纪》全书，文献征引广博是其最主要的优点之一。但仔细梳理可知，这些文献却存在着诸多错漏和不足，具体表现在以下七个

方面。

其一,文字、书目错误。以卷三《法物》之《铜鼓》一篇为例。一是文中引翁方纲《粤东金石略》之言,实抄录自该书卷二《广州府金石二》,其文字不同之处有四:“渔洋先生《皇华纪闻》亦闻”,“闻”原文作“云”^{[15]卷2,15};“下有款式”^{[9]卷3,32},“款式”原文为“款识”^{[15]卷2,15};“今其迹犹存”^{[9]卷3,32},“存”原文作“在”^{[15]16};“穿以(四)索”^{[15]16},脱一“四”字。二是“岁二月十二,祝融生日”^{[9]卷3,31}乃“二月十三”误。三是文中引《新语》内容中,文载:“或曰《晋书》云:诸獠並铸铜鼓,以高大为贵”,查《晋书》并无此言,该句实出自晋裴渊《广州记》,原文为:“俚僚铸铜为鼓,鼓唯高大为贵,面阔丈余”^{[16]367}。由上可知,作者辑录时,在文字方面存在着错误、脱漏以及书目罗列错误等问题。

其二,内容失实。如卷一《神灵》之《南海神》篇中,文曰:“罗泌《路史》以工共(应为共工)氏或为帝,或为伯,而不王;祝融氏或以为臣,或以为火德之主”,此句为崔弼自撰。然其言共工氏为帝为伯、祝融为臣,通观《路史》,未见该书作此论断。相反,其文却有“祝融二世”^{[17]2}之言,已是祝融为帝之言。又如《列朝祭海考证》篇,其文全部录自清《御定渊鉴类函》,错误有三:一是文曰“宋武帝令郡国”^{[9]卷1,22},实则乃南朝梁时“令郡国”^{[18]卷168,10}。二是乾德六年有司请祭江渚,非祭于“扬州扬子江口”^{[9]卷1,2},而是“今请复祭於成都府”^{[18]卷168,13}。三是开宝五年,诏令以“县令兼庙令,县尉兼庙丞”^{[18]卷1,22},非“开宝三年”^{[9]卷1,22}。又元代,元顺帝至正十年,重建乃“河渚及四海神庙”^{[18]卷168,17},非“岳渚及四海神庙”^{[9]卷1,22}。

其三,指代不明。《外纪》中指代不明的情形不少,概言之,大致有三种情形。一是时代不明,如《礼器》与《祭品》两篇中,所录内容皆摘录自《广东新语》,文曰“洪武六年,赐黄金香盒,重十六两,黄绫幡一副。藩臬大夫每春秋仲月壬日致祭,先出香盒于官库,赍至神前,祭毕复归藏焉”^{[19]卷6,7},所述乃明代情形。而作者却未言时代,或有人会误以为乃清代规制。同样,《祭田》篇中南海神庙“共田六顷六十八亩”^[9]、卷六《碑牒》标注多数引用翁方纲《粤东金石略》之内

容等亦如此。二是名词不明。书中所言“邑志”“郡志”之称谓最具代表性。“邑志”一词在全书共出现三次,其中“此段从邑志钞出,语不可解”^{[9]卷1,20}与“按张九皋邑志作九章”^{[9]卷6,43}二处所言“邑志”皆指乾隆《番禺县志》,而“邑志引新语云:南海祠书额宜曰‘南海之帝’”^{[9]卷1,19}之“邑志”却指的是雍正《广东通志》,其文“又南海之帝也”^{[10]卷64,2}乾隆《番禺县志》所述则为“庄周曰:南海之帝”^{[20]卷20,2}之语。“郡志”一词在全书亦有三处,其中“郡志云:韩愈碑扶胥之口、黄木之湾即此”亦指乾隆《番禺县志》;“郡志作达摩之弟……杜公司空,杜讹作社,封助惠侯”一句中“作达摩之弟”乃乾隆《番禺县志》中言,“杜公司空,杜讹作社”是雍正《广东通志》之语;而“郡志引《新语》云:《志》称昭顺王,《语》称明顺夫人,或昭顺为明顺之讹”一句则乾隆《番禺县志》与雍正《广东通志》皆无对应之文字。又乾隆《广州府志》作者则准确无误地称其为“本府志”,若按字面意思而言,“邑志”应指乾隆《番禺县志》,“郡志”则应指雍正《广东通志》,这或是崔弼之本意。三是事件不明。《灵著》篇之第三则故事出自《广东新语》,其原文乃言南海神与“天妃”“二伏波”等海(水)神异事^{[19]卷6,6},非如《波罗外纪》所言,似独言“南海神”之异事。

其四,过度改动。以《浴日亭》篇为例,其首段录自《广东新语》卷一《天语》之“日”一节,崔弼首先将“日”“扶胥浴日”“日出”等大段景象描写删除;次将余下文字顺序完全打乱,其中将《广东新语》作者屈大均观赏扶胥浴日的做法、体验之语则从全篇中部剪切至末尾;后又将“吾尝中夜而起,四顾寂寥,潮鸡始声,月影未息”^{[19]卷1,2}等言删除,只保留“因詠子瞻‘坐看暘谷浮金晕’与白沙‘赤腾空洞昨宵日’之句,心荡神摇,欲拟之而茫然未得也”^{[9]卷2,28},造成文字断片。其他如《木棉》篇、《铜鼓》篇中引吴莱《古迹》等内容皆存在类似情况。

其五,重复辑录。如《南海神》篇中,段首文曰“昌黎碑云:‘南海神次最贵,在东北西三神河伯之上,号为祝融’”^{[9]卷1,19},同篇段中又引《广东新语》曰:“故祝融神次最贵,在北东西三神、河伯之上”^{[9]卷1,20},同样文字引述两次。又如

《波罗树》篇中有关达奚司空立化成神的内容,文曰:“相传波罗国有贡使携波罗子二登庙下种,风帆忽举,舶众忘而置之,其人望而悲泣,立化庙左,土人以为神,泥傅肉身祀之,一手加眉际,作远瞩状,即达奚司空也。”^{[9]卷4,34}此句与《六侯》篇中“达奚司空”内容相同,亦辑录两次。此外,卷一《神灵》“列朝祭海考证”与卷五《年表》之内容亦多有重复。

其六,分类不当。一是卷一《神灵》之“灵著”第三篇载明万历壬午年间“广中查贼肆劫”之事,乃按其史实而记,作者亦自言“此段似非灵著”^{[9]卷1,25}。二是卷二《庙境》“郡城八景”篇载宋元明清历代“羊城八景”之内容,然其后却详述作者生活时代“波罗诞”情形,其内容明显不属于“八景”范畴,故应当独立设置篇目。三是卷六《碑牒》中的部分篇目即便是在作者生活的年代也并非是以碑刻形式存在,其中唐代《册祭南海神记》碑刻便早已不存,只因文中有“以记以石”之言,故录进碑刻中;又“国朝御祭南海神文”的格式以及其中大部分内容乃作者抄录自乾隆《广州府志》中内容,而非原存碑刻。

其七,篇章缺失。梳理卷六《碑牒》中可知,其中辑录清代碑刻之文26篇中,“御祭文”达23篇,其余3篇分别为《圣祖仁皇帝御书南海神庙碑》《祭南海神记》以及《嘉庆五年御赐匾》,轻重明显。可知,作者辑录清代碑文时立足于“御祭文”立场,对相关内容进行了筛选。故其辑录内容不可避免有所遗漏、删减,主要有三种:一是康熙四年(1665)《重修南海神庙题名碑记》,该碑立由平南王尚可喜立,其文至今仍存,原碑出土时“仪门右廊第二块,长宽厚为212×110×12厘米”^{[21]126},或因三藩被废的政治原因,故未纳入。二是康熙三十六年《恭祭南海神庙碑记》,原碑至今仍存。三是康熙四十二年《万里波澄》碑阴题跋,作者生活时代应仍存原碑,亦未录。康熙四十八年(1709)《谕祭南海神文》,仅录“康熙四十八年六月念七日,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史夔”,有关碑文内容未做任何交代,《南海神庙碑刻集》考证该次祭祀与“复立太子胤初”有关^{[4]314-315}。

上述错漏纠其原因有三:一是文字校勘、内容核对不仔细,造成文献出现硬伤;二是概述不

准、归纳不全,导致意思偏颇;三是统稿疏漏、编排缺乏定规,使得词语、篇章存在瑕疵。由上可知,《外纪》内容全面、种类丰富,是难得的南海神庙专项资料集,但在诸多细节处缺少详理精修,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文献价值。

四、余论

《隋书·礼仪志》载开皇十四年(594)隋文帝下诏曰:“东镇沂山,南镇会稽山,北镇医巫闾山,冀州镇霍山,并就山立祠;东海于会稽县界,南海于南海镇南,并近海立祠。及四渎、吴山,并取得侧近巫一人,主知洒扫,并命多蒔松柏。”^{[22]卷7,140}这是有关神庙最早、最直接的文献记载,此后唐、宋、元各代神庙文献虽种类愈增、内容愈丰,但整体存在形式却未有重大变化,皆散落于正史方志、碑牒石刻之中,未有有心留意、俯拾采撷者。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郭棐辑、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陈兰芝增补《岭海名胜记》中专设《南海庙记》一章,是为最早专门整理神庙文献的典籍。到清乾嘉时,崔弼迈出关键且坚实一步,将南海神庙各类文献史料尽心广泛搜罗,粹为《外纪》一书,可谓前无古人之集大成者。书中,崔弼未拘泥于时间、空间及史实束缚,时间上追溯至隋代建庙前古人的海洋海神观念及信仰祭祀事宜;空间上以南海神庙为核心,向周边山脉、河流、城市拓展;史实之外记载了多处传说、灵异,并对通过眼看、耳听得来现实状况进行了忠实记录,形成其生活时代全新文献。以上种种,皆殊为可贵,应为今人珍视。

参考文献:

- [1] 赵磊. 清崔弼辑《波罗外纪》考述[J]. 惠州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1).
- [2] 赵磊. 清崔弼辑《波罗外纪》续考[J]. 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2).
- [3] 周振甫. 诗经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 [4] 慕平. 尚书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 [5] 杨天宇. 礼记译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 [6] 譙周. 古史考[M]//章宗源, 辑. 丛书集成新编: 第110册. 光绪甲申刊本.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5.
- [7] 李昉. 太平广记[M].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8] 吴莱. 渊颖集[M]. 四库全书荟要版.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5.

[9] 崔弼. 波罗外纪[M]//陈建华. 广州大典:第34辑第21册. 广州:广州出版社,2008.

[10] 郝玉麟,等. 广东通志(雍正)[M].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1] 孙廷铨. 南征纪略(钞本)[M]//沈云龙.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2辑. 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12] 王士禛. 南来志(内府藏本)[M]. 济南:齐鲁书社,1996.

[13] 朱彝尊. 金石文字跋尾[M]//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二十五册.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

[14] 吴震方. 岭南杂记[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15] 翁方纲. 粤东金石略[M]//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第十七册.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

[16] 裴渊. 广州记[M]//王谟. 汉唐地理书钞. 北京:中华书局,1961.

[17] 罗泌. 路史[M].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8] 张英,王士禛. 御定渊鉴类函[M].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9] 屈大均. 广东新语[M]. 北京:中华书局,1997.

[20] 任果,等. 番禺县志[M]. 清乾隆三十九年刊.

[21]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黄埔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南海神庙古遗址古码头[M]. 广州:广州出版社,2006.

[22] 魏征. 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3.

Literature Research of *Boluo Biography* Collected and Written by Cui Bi of Panyu in the Qing Dynasty

ZHAO Lei

(Huangpu District Museum, Guangzhou 510700, China)

Abstract: *Boluo Biography* consists of two parts: the one collecting the works of predecessors and people of the time, and the other written by himself. The former accounts for about 90%, which is the main body of the book, while the latter accounts for about 10%, which serves the former and makes up for its shortage. The time span of literature in the book is about 2400 years, which is from the middle of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o the middle of Qing Dynasty. The historical period of literature is mainly after the Tang Dynasty with the literature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70%. There are a wide range of references in the book with a total of no less than 45 kinds. However, there are seven kinds of errors in many details, that is, word errors, inaccurate content, unclear references, excessive alteration, duplicate collection, improper classification and missing chapters.

Key words: Cui Bi; *Boluo Biography*; literature

(责任编辑 陇 右)